◈纵　横

盯住“短板”谋发展

补齐短板，首先必须发现短板。而要发现短板，则离不开强烈的问题意识。拿江苏省来说，尽管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城乡发展的差异问题，公共服务不均的问题，六大重点扶贫片区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等等，依然还比较突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我们首先补齐这些看得见的“短板”。

而一些看不见的“短板”，或者说对照更高目标而实际存在的“短板”，则需要我们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去发现它，进而攻坚克难去补齐它。最近，江苏省委常委会到南京集体调研强调着眼未来五年发展，南京也要着力“补短板”，大家都需要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

补齐短板，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比如，现在不少城市绿树成荫，但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特别是老百姓关心的空气、水环境的治理上，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些城市“面子”漂亮，硬件很好，但“里子”则依然如故，管理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再比如，一些地方GDP数字增长较快，但民生保障水平则没有同步跟上，百姓获得感还不够。凡此种种，对照“强富美高”的目标，我们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看清楚这些短板，并且下决心去补齐它，让下一个五年的发展更加全面、更加协调。（2015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耿联）

◈杂　谈

谏诤之风因何盛

贞观初年，李世民为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听取了大臣萧瑀的建议，欲实行封建制，让朝臣议之。时任礼部侍郎（相当于今之副部长）的李百药上长篇奏疏《封建论》，言辞非常尖锐，说这一制度，是一种倒退，并举历史之例，指出分封世袭制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说封邦建国之后，那些受封的家族就会以门第自傲，不愿再靠才干进取，并且会一代比一代骄奢横暴。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那些被朝廷依为屏障的所谓藩国，就会变成仇敌，以致战争不断。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事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某些昏暴之君当政的朝代，反对皇帝想要推行的政治制度，是要被贬官乃至坐牢砍头的，但李世民却听从他的谏言，不仅取消了封建诸侯之议，而且委之以教导太子的重任。

贞观九年（635年），高祖李渊驾崩，李世民下诏为老爹大建陵寝，其规模仿照汉高祖刘邦之长陵，务从隆厚。时任秘书监（掌管国家藏书与编校之事）的虞世南上书谏阻，说修高陵大墓，用很多珍宝陪葬，是害了亲人，不算是孝，薄葬才是长久之计。汉武帝的茂陵中堆满珍宝，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掘开茂陵，还未拿完。无故聚敛百姓财富，太无意义。甚至引用魏文帝为自己善后所作的《终制》之言：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无有不被发掘之墓，等到金缕玉衣被烧被抢，骸骨并尽，就太可悲了，如果违背我的诏制，举行厚葬，那就等于让我被戮尸于地下，又死一次啊！由于言辞过于激烈，李世民不予理睬，他上书再谏。公卿也随之上书，请遵高祖遗诏，务从节俭。李世民只好缩减规模，节俭从事。李世民喜于秋冬狩猎，虞世南又上书谏阻，劝其停下猎车，收起长戟，射禽斗兽之事，任用群下为之。虞世南多次犯颜直谏，毫不隐讳，李世民反而待他更加亲近尊重。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下诏发兵修建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时任给事中（掌管批改百官奏章）的张玄素，闻讯上书力谏，说李世民承百代君王之后，处凋敝萧条之时，必须节之以礼制，以自身做出表率，若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恐将重蹈秦、隋两朝的覆辙。这简直是危言耸听，恐吓皇帝了。他甚至说：“陛下役使受战争创伤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呀！”李世民看罢奏书，怒曰：“你说我不如炀帝，我可如桀、纣？”张玄素毫不畏惧，直言对曰：“若不罢此役，恐怕将像隋朝一样导致变乱。”李世民听他说得有理，不但收回成命，而且赏赐他彩帛两百匹，以示表彰。

贞观一朝，直言进谏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但因李世民鼓励朝臣谏言，使其制度化，而且谕令有司“诏敕不便于时，即宜执奏，不得顺旨执行”。所谓“顺旨”，即顺应皇上旨意，也即做应声虫。据史籍载，李世民曾多次对应声虫表示厌恶，他曾严厉批评一些只会顺旨行事的官员说：“此来唯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李世民游园时，见一棵树枝叶繁茂，赞为嘉木，随行大臣宇文士及也跟着赞不绝口，他很是厌恶，正色说：“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一直不知佞人是谁，曾怀疑是你，果然不错。”对于那些敢于谏诤的朝臣，李世民则予以重用或赏赐，故群臣多以媚上为耻，敢谏为忠。连在隋朝“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的重臣裴矩，归唐后也一反常态，变成了直言敢谏之臣。反之，李世民若是像那些专制暴君一样拒谏饰非，闻过则怒，对谏言者贬官治罪，乱捕滥杀，使进谏成了“找死”的代名词，满朝文武则不是变成立仗马、秋后蝉，就是变成了应声虫，中国历史上像关龙逢、比干那样敢于冒死进谏的人毕竟不多。由此可见，君主是否拥有善于纳谏的胸襟至关重要。（2015年第10期《唯实》　梅桑榆）

◈观　点

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四类下沉人才

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向上流动型人才与向下流动型人才都是人才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此之间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替代。那些“下沉”到基层型人才，接触的民众更多，其作用范围更广，可以改善和优化固有的社会人才结构，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人才下沉也能够更容易了解基层状况，便于发现社会问题的根蒂，也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从当前我国发展的实践需求看，迫切需要四类下沉的人才。

其一，政治型人才的下沉。政治型人才下沉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是世界通行的做法。通常有两种状况：一是主动的下沉，二是被动的下沉。据中组部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实施“三支一扶”工程以来，五年内全国共有14.3万名大学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远远超过规划的十万人规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学生都是主动下沉型人才，对于激活基层政治资源、促进基层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相反，需要反思的是被动的人才下沉，当前呈现出“三多三少”的特征：高配、高福利激励多而纯粹的道德激励少；零星的干部配置多而建制性设置少；科层制的命令型下沉多而主体的志愿型下沉少。无疑，这种被动下沉的状况并未实现人才下沉所应达到的目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人才被动下沉中存在的抵触因素，也是政治设计不科学所致。

其二，知识型人才的下沉。当前，我国正在处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各类知识型人才充实到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第一线，积极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将我国打造成为科创强国。科教卫生等系统的人才下沉也是当务之急，大批专家学者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资源优势较好的单位，客观上固化了“择校”“挂号”等难局。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人才筛选机制出现了较为开放的趋势，“教（医、研……）而优则仕”正在兴起。开通这种“向上流动”的渠道无疑是必要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才下沉的实现：一方面，大批知识型人才进入政界，“入世”变成了“入仕”，在事实上削弱了知识人才的科创实力，也在客观上降低了知识的生产率；另一方面，知识型人才游离于知识界与政界，弱化了知识符号或知识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特征，不利于从整体上推动知识传承与知识生产。

其三，社会型人才的坚守。社会型人才原本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社会，是所有主动下沉型人才的代表，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因而在社会上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当然，主动“沉”在社会基层的人才也存在差异性，怀才不遇、修心养性、等待时机者也可能不乏其人，但他们在基层社会的存在价值就是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发展。这些人才的坚守体现了积极的道德操守。在当今社会流动日益加快的信息社会里，各种诱惑充斥其中，这些坚守的社会型人才如果数量众多，就能够形成显性的社会结构群体，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四，下沉到社区型人才。社区治理有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一是各类草根社团型人才，他们直接接触社会底层民众，并致力于帮扶救助等公益事业；二是社区管理型人才，他们活跃于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调解社会矛盾、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等。从目前我国社区现状看，这两类人才的结构并不令人乐观：草根社团型人才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并不是社区的长期参与者；社区管理型人才多由退休干部或知识分子构成，他们无法在职业群体和青年群体中获得认同。无论是草根社团型人才还是社区管理型人才，他们都拥有相当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资本网络，也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如果在人才结构上有所优化，则社区自治的进程将大大加快。（2015年11月16日新华网　吴新叶）

如何应对发展滞后的国产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信息安全的“命门”，因其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性强、开发难度大和附加值高而成为各国竞相发展的重点。近年来连续发生的“棱镜门事件”、“XP停止服务”和“Win8禁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国产操作系统再度成为关注焦点。而令人尴尬的是，国内操作系统市场目前为微软等跨国公司垄断，市场上基本没有成熟的国产操作系统可用。因此，加快发展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操作系统已经迫在眉睫。对此，笔者有以下五点建议。

第一，积极推进国产操作系统的生态圈建设。国家除了在政策、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继续对国内软件企业加大扶持的同时，应采取政府引导、独立运营、共同出资和利益共享的方式，积极整合软件开发者、芯片厂商、终端厂商和运营商等产业链上的各主体，构建起一个包括配件、终端和应用服务等诸多环节的完整的生态圈。

第二，加强操作系统相关领域的反垄断体系建设。当前，应重点加强基础软件领域的反垄断体系建设：一是针对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产品的特点，进一步落实《反垄断法》，为国产软件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全面提升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整体能力和确保执法的统一化、平衡化和常态化。三是在强化基础软件领域反垄断执法机构职责的同时，进一步细化反垄断执法的程序规范。

第三，抓住“云”带来的契机发展国产操作系统。结合云计算时代操作系统核心架构和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趋势，转变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思路，积极抢占云时代的制高点，快速确立我国在云计算领域的优势。

第四，以产学研用结合的方式推进国产操作系统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主动推进和引导国产操作系统发展中的产学研用相结合，让产学研用更紧密地互动起来，让需求与研发对接、产业与用户对接、上游和下游对接、前端和后端对接，以此加速国产操作系统发展速度。

第五，加强国产操作系统的宣传与培训。一是针对当前国内用户对国产操作系统认知不足的现状，教育部门应及时修改相关教学大纲，鼓励采取开放源码教学。二是国家财政部应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各级政府采购负责人对国产操作系统的了解。鼓励国产操作系统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培养相关专业人才。（2015年10月《中国国情国力》张厚明）

◈评　论

巴黎恐袭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13日晚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此次恐袭，也是继“9·11”之后，恐怖主义势力对人类文明的又一次重大挑战。截至巴黎当地时间11点，官方公布的伤亡数据为至少128人死亡，逾250人受伤。已发现8名恐怖分子死于此次袭击，其中7人自爆，1人在枪战中被击毙。

巴黎恐袭，震惊世界，因为如此血腥暴力的野蛮行径，是反人类的恶行，也挑战了人类底线。这一天，不仅是法国人民的灾难，也是整个人类的厄运，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暴恐袭击，每个有良知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谴责。

毋庸置疑，此次巴黎恐袭，客观上也是对G20等全球治理机制的挑战：应看到，恐袭的发生节点就处在多个全球领导人峰会开启的节点上——11月15日至16日的G20峰会、17日至19日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及11月30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后者将在巴黎召开）。正因如此，如今各国领导人都对此次恐袭作出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表示对这一野蛮行径予以最强烈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示，此次恐怖袭击不只针对巴黎的无辜平民，而是对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攻击。

可以想见，在开启的G20峰会上，安全反恐议题或将受到关注。本质上，巴黎暴恐与G20峰会，也是全球化两股力量的对撞：自2008年以来，后者在应对危机、促进增长、推动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之一，它本身也在为抵御和防止恐怖主义打下“全球协作”的桩子。

应看到，以IS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问题全球化里极端中的极端。眼下在北非、中东等多个国家，经过地区战争后，政权重建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在外部强力推动中东国家政权形态巨变的过程中，IS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扩展了自己的“版图”。数年来，IS崛起的负面影响已经几乎遍及全球。首先是以先进的技术和手段招募激进分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恐怖大本营。其次是导致了难民问题的扩大化，难民如潮水般地涌入了邻近国家乃至遥远的西欧和北欧。

在G20峰会召开之际发生的巴黎恐袭，昭示了全球携手反恐的紧迫性。基于此，一方面，G20要表达对巴黎恐袭的高度关切，要表达各国一致反对恐怖主义的决心，加强反恐的全球化协作；另一方面，G20也应当坚持其自身的轨道，坚持其“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定位，从“治本”上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还应看到，G20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代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G7机制代表性不足，IMF和世界银行机制存在缺陷，催生了G20等新兴机制和组织。G20成员国的人口占全球的70%，贸易额约占全球的80%，经济总量则占到全球的90%。目前，在中国等国家的推动下，该机制的全球治理舵手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正在突显。此次土耳其峰会的主题便是“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

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也亟须促进增长与发展、推动经济合作、改革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合理之处。这些都是G20的核心议题。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在贫穷、动荡和发展不平衡，故G20也应通过切实的措施，从经济、金融方面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并开展长效经济发展合作，从根源上消灭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APEC上海峰会就以加快亚太一体化建设作出回应。因此，此次G20峰会在回应巴黎恐袭的同时，也该通过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

说到底，经济全球化和问题全球化，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个在以市场经济规则和自由资源配置推动全球福祉，一个在以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和行动填补统治权力真空。在G20峰会等召开的当下，各国也当同心相向、共育强大的全球治理能力，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全球化的威胁。（2015年11月15日《新京报》社论）

◈视　界

在德国当农民

于德国人而言，农民不仅是一份职业，还是一种身份，德国农民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

当农民，工作和生活令人羡慕

在德国当农民意味着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一般而言，事少、钱多、离家近是人们通常衡量好工作的标准，而作为一名德国农民，这三者结合得不错。事不算多。德国强大的制造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农机具，农机具的普遍应用，使农民的劳动强度比一般白领大不了多少，某些种植业农民更是有大段的农闲时间。钱不算少。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在3.6万～5万欧元之间，总体属于德国中上水平。离家近。这是毋庸置疑的，多数农场是生产和住宅的统一体，简直不能更近了。

在德国当农民意味着拥有美好的生活环境。德国西南部乡村富绰、安逸的生活尤为令人着迷。新鲜的空气、如画的风景、方便的生活，再加上高品质的居住空间，令不少德国人愿意以乡村为家，只因为稻粱谋，才不得已每日奔波城乡间。于是，乡村人口开始增长，最好的医生都来到郊区开诊所。乡村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堪称丰富多彩。典型的德国农村里，几乎每个村都有“音乐协会”“足球协会”“唱诗班”等组织，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们每周聚会交流。下午茶时间，男人们坐在街边喝啤酒聊天，一派悠然景象。节日里，男女老少陆续来到广场，布置好啤酒饮料车和烧烤快餐摊，伴着音乐，年纪稍长的人坐在一起畅饮说笑，年轻人站成一圈碰杯豪饮，兴致高涨时，干脆唱起民歌……

在德国当农民意味着没有后顾之忧。从各种民间组织到保险公司再到政府，这三层组织为农民的切身利益保驾护航。第一层：众多民间组织。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等诸多机构帮助维护农民利益。德国农民协会下设有300多个地区性的组织，从“种”到“收”，从提供信息到农资供应，协会向全国九成以上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农业合作社以提供低息贷款、规范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标准、帮助农民以低价使用大型农机具等方式，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层：德国农业社会保险联合总会。德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的医疗、养老、意外伤害等保险由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联合总会承担，覆盖到每个农民，为之竖起风险防范墙。第三层：欧盟、德联邦和州三级政府。不低的农民收入中，有50%左右来自政府补助，这使德国农民保持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和抗风险能力。最近，欧洲农产品因为配额放开而产量大增，加上俄罗斯减少60%的欧盟农产品进口，导致欧洲农产品价格大跌，德国也未能幸免。为此，欧盟立马拿出额外的5亿欧元补助，安抚农民受伤的口袋。

职业高门槛，城市学生爱农业

这么好的工作，当然受欢迎。但在德国，要从事农业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可是个高门槛的职业。德国国家电视台一项“大学生就业”的调查显示，农业学科不仅是几个报考热门专业之一，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三大专业。总体而言，九成以上的农业大学生毕业后扎根农村，学以致用前景好。

当普通职业农民虽然用不着读大学，可政府的要求也不低：任何农民都必须在农业专业学校接受至少两年的教育，才能持证上岗；对农场主要求更高，即使是一个有长期务农经历、拥有大量实践经验的农民，也需要经过两年的专业学习，通过国家考试后，才能获得独立经营农场的资格。农场主如果想扩大仓库、牲畜存栏，都需要政府的许可。想取得许可，就必须接受相关的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

德国的农业发展以中小家庭农场为主体，得益于高度机械化，一般中等规模的种植养殖农场基本由家庭成员维护，只在农忙时请些临时工，不多的农民就可以管理大规模农场。农场主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高收益，除了要懂生产，还要学习经营管理、电子商务甚至期货交易，这些都属于培训内容。德国农场供销已实现电子化，大型粮食贸易公司每天公布大豆、玉米等的收购价格，农场主浏览期货市场的行情后，一旦觉得价格合适，就可以出售。购买农具、种子等也大多通过网络完成。因为学有所用，农民非常愿意参加各种培训。

政府扶持力度大，农业有可持续发展力

和所有的发达国家一样，德国也采取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帮助和保护农业生产，反哺形式是政府直接向农民发放带激励性质的各种补贴，这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德国的农业和农村除了为本国提供食物以外，还具有保护自然资源、美化乡村景观等功能，这使得环境保护也成为农业发展的目的。因为传统方式获得粮食要用化肥和农药，对土壤环境不好，政府鼓励采用少耕、休耕方式保护土壤，在农业用地上种花、种草、种树，这一政策在美化乡村风景的同时，还顺道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政府积极鼓励生态农业，要求生态农场主在耕作过程中，不使用化学农药、肥料、除草剂，而采用传统耕作方式，辅以合理多样的轮作、间作来提升土壤肥力。值得一提的是，一旦发现农民违反规定，政府不但要取消补贴，还要予以罚款。由于生态农业农民50%以上的利润来源于政府补贴，补贴一旦被取消，农产品就无法与其他农场主竞争，有破产的危险。

尽管德国农业发达，农村生活也美好，但对于出生乡村的年轻人而言，城市总充满了希望和无尽可能，总希望去闯一闯，于是，难免出现有些农场后继无人的局面。对此，德国人很有紧迫感。各地都费尽心思组织各种农业展会。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巨型拖拉机上爬上爬下，在家禽家畜体验区与动物开心互动，孩子们可以抚摸和喂养奶牛、怀抱毛茸茸的小羊、与萌态十足的羊驼“对话”……展会看上去就像农业主题的游乐园。这些展会打开让城市人特别是儿童全面了解农业的窗口，唤起了人们心底的土地情怀，使这一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人心中扎下了根。（2015年总第17期《群众》许文骏）